



傅斯年

臺灣大學自由學風的捍衛者

歐素瑛(國史館協修)撰

壹. 家世與求學



▲ 傅斯年於臺灣大學校長任內留影
圖：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提供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3月26日生於山東省聊城縣。祖父傅淦，字笠泉，為前清貢生，博通經史，且精通醫理，性喜遨遊。淦長子旭安，字曉麓，即傅斯年之父，於1894年得舉人，曾任山東省東平縣龍山書院山長。1901年春，傅斯年6歲，入孫達宸學塾攻讀，父、祖課讀於家。1904年，傅旭安病歿，享年39歲，父母均在堂。此時，傅斯年才9歲，其弟傅斯巖才7個月。

翌年春，傅斯年入東昌府立小學堂讀書，傅淦以居家課孫為樂，不再出遊，為傅斯年奠下札實的文史根柢。斯年父旭安有一弟子侯延燠，少時孤貧，為商店學徒，但極好讀書，旭安見其為可造之才，乃助其入龍山書院就讀。之後，侯延燠考取進士，返回故鄉時，恩師已經過世，他便自誓要撫養傅斯年兄弟成人。1908年，傅斯年隨侯延燠至天津，住傅淦門生孔繁淦家中，父執吳樹棠按時接濟。翌年春，考入天津府立中學堂，開始接受新式教育。1911年，傅斯年16歲，與同鄉丁馥萃女士成婚。

1913年夏，傅斯年讀完四年中學課程，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乙部，攻讀文史。傅斯年身體雖不甚強健，但成績常為同學之冠，在課外活動中亦嶄露頭角，與沈沅等人發起成立「文學會」，後擴大改組為「雄辯會」，以修繕辭令、發展思想為宗旨。三年後，升入文本科國文門，對章太炎的古文經學頗有興趣，且深得劉師培、黃侃等國學大師的器重。期間，寄宿校舍，室友有顧頡剛、狄君武、周烈亞等人，並認識羅家倫、毛子水等學友。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秋，年僅27歲的胡適至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驚異於傅斯年



中國文學涵養之深厚，傅斯年則心服於胡適的科學思維與新見解，因而投身新文化運動。

1918年夏，傅斯年約集羅家倫、毛子水、顧頡剛等20人，創立「新潮社」。翌年1月1日，主編《新潮》月刊創刊，提倡新文學運動。5月，五四運動發生，傅斯年被推為北京大學20位學生代表之一，對現實問題及政治活動表現出高度的熱情。是年夏，傅斯年自北京大學畢業，旋回山東參加官費留學考試，成績優異；惟少數試官以傅斯年為五四主角而不擬錄取，經教育廳科長陳豫力爭，堅持以考試成績為準，終得上榜。年底，由上海啟程赴英國留學。

1920年夏，傅斯年進入英國倫敦大學大學院隨實驗心理學大師史培曼（C. Spearman, 1863-1945）研究實驗生理、心理、物理學，兼治數學，開始學習西方的科學知識和理論。二年後，鑑於動物行為研究無法應用於人類身上，而對心理學感到失望。1923年秋，轉至德國柏林大學哲學院研究量子力學及比較語言學。當時柏林大學以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論而名震全球，加以德國多年來以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著名於世，傅斯年置身如此的學術氛圍中，加上陳寅恪、俞大維等友人的影響，研究興趣乃逐漸轉向歷史語言學。1926年冬，傅斯年結束六年海外留學時光，自德國返國。留學期間，廣泛接觸的各種新學術，對其一生的思想及事業發展影響甚巨。

貳. 肇劃歷史語言研究所，開啟近代學術研究

傅斯年自歐返國後，於1926年接受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之邀，至該校任教，兼文學院長及國文、歷史兩學系主任，開設尚書、古代文學史、陶淵明詩、心理學等課程，開始其一生的學術志業。是年秋，與顧頡剛等人在該校創立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創辦週刊，招收研究生。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首任院長為蔡元培，傅斯年與顧頡剛、楊振聲等同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籌備委員，嗣任秘書、專任研究員、兼代所長，翌年6月真除所長，對院內重要制度的確立、各種方案的訂定等，傅斯年皆有所貢獻。

傅斯年主張「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講求在科學實證的基礎上，注意史料的蒐集、整理及批判，其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創刊號發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指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我們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對近代歷史學研究頗具啟發、推動之功。其次，在考古人類學方面，隨著二十世紀初現代考古學（archaeology）的引進中國，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亦致力於考古發掘、調查工作，尤以河南安陽殷墟考古最為重要，自1928年至1937年的十年間，計發掘15次，先後由董作賓、李濟主持其事，所獲之龜甲、骨骼、器物等資料極為豐富，不但足以證實文獻記載和發掘之遺跡現象相關，且能對殷商時代中國文化之發展情形提供具體證明，對於文化學術事業貢獻頗大。

在民族學方面，以對中國西南少數民族之田野調查成果最著名。最初之調查行動，始於1928年該所助理員黎光明的川康邊境之行。之後，凌純聲、芮逸夫、陶雲逵、馬學良等人相繼加入，並開始有計劃地展開調查行動。1933年，凌純聲、芮逸夫等赴湖南調查湘西苗族。翌年，又赴浙江白門、麗水調查畚民。同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和雲南省政府合作，進行雲南省內的民族調查，自1934年至1937年間，足跡遍及雲南各地，接觸到的族群有30餘種之多。嗣後，又進行貴州苗族調查、「西番」和羌族之考察，以及川南苗族考察等。在歷時20餘年的西南邊疆少數民族考察中，總計蒐集到1,100餘件之民族文物、各少數民族文書800餘種、田野照片約8,000張，以及許多語言、民俗、體質測量等資料，成果甚豐。

1929年春，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往北平，9月，傅斯年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講授秦漢史、先秦史、史學方法導論、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上古史等課程，努



力培植中國新史學研究的生力軍。期間，建議蔡元培院長收購明清大庫檔案，請陳寅恪整理研究，輯印為《明清史料》一至四輯，共40冊，為明清史研究留下珍貴的一手史料。嗣又在國內廣蒐《明實錄》寫本，作有系統的校勘整理工作。1932年，日本為合理化占領中國東北而大力宣揚「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並支持成立「滿洲國」。對此，傅斯年特奮筆疾書，於10月出版《東北史綱》第一卷，運用民族學、語言學及古籍中史地資料，證明東北本為中國郡縣，與中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嚴正駁斥日人謬論，稿成後由李濟節譯為英文，送交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Lytton Commission）參考，頗受到重視。

1933年春，歷史語言研究所再遷往上海。同年夏，傅斯年兼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及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1934年夏，與元配因個性不合而離異，8月5日，與俞大綵在北平結婚。是年冬，歷史語言研究所三遷至南京。翌年9月，傅斯年40歲，獨子仁軌出生，取其名是為了紀念唐朝時在朝鮮打敗日本的武將劉仁軌，可見其內心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8月，歷史語言研究所四遷至湖南長沙，翌年春，為避戰禍，五遷至四川昆明。7月，傅斯年兼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出席大會期間以建議政府整刷政風為主，尤其反對危害國計民生的貪污事件，對權貴抨擊不稍假借。8月，促成寄存於香港的《居延漢簡》安全運抵美國國會圖書館，免遭戰火波及。是年冬，歷史語言研究所六遷至四川省南溪縣。在其主持的23年間，推動考古發掘、語言和民族調查、收集重要史料和書籍，以及刊行專書70餘種、論文500餘篇，徵聘及造就研究人才百餘人等，使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為傑出的學術研究機構。1940年至1941年兼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因勞累



▲ 傅斯年於辦公室內留影

圖：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提供

過度，左眼出血，休養兩個月始稍痊癒。1941年3月，復因高血壓入院治療四個月。

參. 代理北京大學校長，致力於接收復員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傅斯年聞訊大喜，攜酒至街上狂歡慶祝，直至精疲力竭才回家休息。勝利之後，復員為當務之急，尤以學術教育機關最為重要。8月15日，教育部長朱家驊轉達蔣介石之意，擬任命傅斯年為北京大學校長，傅斯年堅辭，並推薦胡適為適當人選，且願於胡適滯美期間，暫代北京大學校長，挑起復員遷校回北平及接收偽北大重任。時北大仍與清華、南開大學合組西南聯合大學，校內情形錯綜複雜，是年12月，傅斯年飛昆明處理因國民黨軍隊殺害一西南聯大學生而引發的學潮。由昆明返回重慶後，又發表決不錄用偽北大教職員的聲明，遭致左派人士的攻詰。面對如此局勢，傅斯年仍決意掃蕩偽北大教職員，並搜集證據向法院檢舉偽北大校長鮑鑒清附敵罪行，至於偽北大學生則須經過甄試，才能進入北大繼續求學。

代理北京大學校長一年期間，傅斯年為北大廣延教授、充實師資、整頓學風、籌措經費，並爭取相公府、黎元洪故居、舊國會大廈等處為北大校舍，另在文、法、理三學院之外，增設工、農、醫三學院，使北大成為一所門類齊全的綜合性大學。1946年7月，胡適自美返國，傅斯年即辦理校長交接，前往南京。是年冬，歷史語言研究所遷返南京，並接收日人在北平設立之人文科學研究所全部藏書及續修四庫全書提要等資料，使歷史語言研究所的藏書更加充實。

傅斯年久患高血壓症，原擬戰爭結束即赴美就醫。嗣因代理北大校務而遲延。1947年6月，傅斯年攜家眷赴美養病。翌年，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傅斯年欣然接受；但對山東省選其為立法委員，則堅持不就。8月，國內情勢日益惡



化，傅斯年不顧身體違和，毅然束裝返國，繼續主持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務。是年冬，北平受到圍城之苦，南京亦告緊張，傅斯年乃向政府力洽派飛機至北平營救學界精英，並將歷史語言研究所完整地遷至台灣楊梅。

肆. 接掌臺灣大學，歸骨于田橫之島

1948年12月，臺灣大學校長莊長恭離台，由醫學院長杜聰明暫代校長職務，不久，行政院會議通過任命傅斯年為臺灣大學校長，以安人心。傅斯年對於出任臺灣大學校長一職，最初以其自美歸來剛過半年，且醫生囑咐不能擔任行政職務為由，嚴辭拒絕。但在教育部長朱家驊及多位友人的力勸下，始決定接受任命，成為戰後臺灣大學第四任校長。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抵台後，隨即揭示「開誠心、布公道」的辦學態度，希望在安定中求進



▲ 傅鐘

步，使臺灣大學成為一所理想大學，尤其是一所以學術研究為目的的大學。臺灣大學的前身為1928年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主要在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致力於華南、南洋地區自然和人文的研究和開發，自主性明顯不足。戰後接收之後，自然應該改絃更張，尤應去除其工具性和政治性。是故，傅斯年除致力於三至五個月內使文、理學院達到全國最好的大學的目標外，並設法使臺灣大學與已遷台的中央研究院等機關合作，展開學術研究工作，期於最短期間內將臺灣大學的學術水準提升到全國第一。

其次，傅斯年以其豐沛的學術人脈，先後聘請多位國際知名的教授到校，如李濟、姚從吾、劉崇鋮、勞榦、鄭通和、董作賓、毛子水、英千里、張肖松、錢思亮、梅仲協、蔣碩傑、全漢昇、趙連芳、黃文等，其結果，臺灣大學的師資逐漸轉為以中國大陸學者居多，台籍師資則不及5%。儘管如此，傅斯年

仍常以培養台籍人才為念，認為台籍同仁以往出國進修的機會較少，由是規定選送教員及畢業生出國時，台籍師生應獲得優先及較多之機會。其次，由於台籍、中國大陸籍教師之薪資待遇差別懸殊，影響校內人事之和諧，傅斯年特於行政會議中提出調整待遇案，重新審查教師之學經歷及研究能力等，再依同一標準重新調整，以拉平彼此之差距。對於不適任教師則不予續聘。在其一年十一個月任內，前後辭聘之教師多達70餘人，對其中特別窮困者，則轉聘為圖書館編纂，顯示其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 傅園

然而，傅斯年所延聘之師資卻遭致外界不少的質疑，其中，反共專家葉青指傅斯年繼承北京大學自由講學、自由研究的風氣，出任臺灣大學校長後，亦將自由主義作風帶到台灣來，在學術自由的掩護下，所聘教授中竟有共黨份子和親共份子，以致學校成為政治特區，

院系成為共產黨細菌的溫床，赤焰相當高漲。對此指控，傅斯年特別予以駁斥，指報導中對法學院長薩孟武、副教授張立之攻擊，明顯缺乏事實根據，對文學院教授李霽野無故離職，傳聞前往共區一事，業已函請警備司令部查明在案，完全依法辦理，豈有袒護親共份子之理？申明其堅持學術獨立、拒絕政治力干涉學術的立場。

之後，隨著國共情勢的轉變及中央政府遷台，臺灣大學的師資亦出現重大轉變。傅斯年有感於局勢混沌未明，倘若時局漸告澄平，外省籍師資恐多不願留台；倘若中國大陸不幸淪陷，則外省籍師資來源必然宣告斷絕，於是決定自行培養師資，就各系應屆畢業生中選拔成績優秀者留任助教，但所擔負的行政工作不多，主要從事學術研究，且其後大多赴國外大學進行短期研究或進修。據此標準留任助教者，計有馬漢寶、黃金茂、侯健、何廷瑞、洪祖培、黃際



鍊、康有德等人。由此可見，傅斯年對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之用心。

在學生事務上，傅斯年以臺灣大學與中國大陸各大學差不多，共產黨的活動頗為活躍，深深體認「學校動盪是政治動盪的前奏」，由是到任之初即擬定三大教育原則，亦即是使學生「有房子住、有書念、有好玩的東西玩」。如此辦學，共產黨即難有可乘之隙。同時，對學生之品德教育亦甚重視，尤其要求學生立誠、辨別是非及不扯謊等。然而，其到任未久即因學生單車雙載而爆發「四六事件」，大學當局要求警備司令部將拘捕名單上之學生即日移送法辦，非名單上所列的學生應迅速交保釋放，冀將事件之影響降至最小。之後，又陸續發生各種學生風潮及師生涉案被捕事件，頗令傅斯年頭痛不已，自言其來臺灣大學後「第一學期在應付學潮」，耗費不少精力。

對於學生生活，傅斯年亦是照顧得無微不至，包括籌建學生宿舍、增設各種獎學金、接濟斷炊的外省學生，以及為罹患肺病的同學闢設特別宿舍等，其中，尤以籌建學生宿舍最是當務之急。傅斯年認為臺灣大學學生40%以上是外省人，其中，家在台灣或有辦法者不到10%，其他30%都是流亡學生，食宿均無著落；而50%以上的台籍學生，至少有三分之二家中經濟條件並不寬裕，亦即臺灣大學大體上是一所沒有錢人的大學，研究室裡、教室裡乃至廁所裡到處都住著學生，令大學當局深感頭痛，於是積極向省政府爭取經費，籌建宿舍。短短一年內，建築宿舍樓房四座，可容納1,800餘人，解決了學生住宿問題。

在協助學生解決生活問題後，繼以加強課業來督促師生。1949年4月，傅斯年於校務會議中提出〈一年半內辦好臺大〉的報告，指出臺灣大學面對不斷擴張的學生人數，大一共同課程所需的大教室、實驗室及圖書儀器設備等嚴重不足，為了充實一、二年級基礎學科之教學，宜優先增設大教室及學生實習室、充實本部總圖書館及法、醫兩學院圖書分館。同時，為能逐步恢復臺灣大學的研究功能，將於校內組織改進大一課程委員會，敦聘富有教學經驗或學術貢獻之教授擔任一、二年級一般科目，加強學生實習課程及其師資，以及充實研究

事項、與建設機關合作等，期於一年半之內，改進這類課程的品質，並提升學生程度。

在校務的整頓上，以醫學院著力最多。傅斯年曾自言在臺灣大學期間，一半放在醫院的事情上。其認為醫學院向以研究為第一要務，對看病卻不熱衷，日籍教授返國之後，又未曾盡全力補充，領導人才尤其不足，致使一切頗為鬆懈，亟應加以改革。因此，就任不久即將沿襲日治時期稱呼而與中文用字習慣不符的「附屬醫院」改為「附設醫院」，並任命杜聰明為醫學院院長，魏火曜為附設醫院院長。接著，將第一、二、三內科合併為內科，第一、二外科合併為外科，並廢除無給助教制度，仿倣美國實施「住院醫師制度」，將院內的助教和無給助教改為住院醫師，改採美式醫學院和醫院制度。同時，採取「金字塔制」之升級制度，要求醫學院各科每年須淘汰5%的教員或醫師，此舉雖引起不小反彈，卻使得醫學院不斷地進步。

另一方面，傅斯年指大學內若干事項有如結核病狀，毫無效率可言。一件事從開始辦理到辦出來，所花費的時間至少是原定的三倍，如此不但浪費國家錢財，且耽誤學生之課業，因此，決議淘汰請假過多、不按時到、不負責任或能力過差之職員。例如1950年熱帶醫學研究所查出舞弊事件，經撤換所長、職員後，該所逐漸步上軌道。7月，總務處又爆發盜賣教育部存放臺灣大學儀器、藥品之大竊盜案，傅斯年誓言「清算臺灣大學中一切敗類」，於最短期間弊絕風清，使校務邁入正軌。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列席省參議會第五次會議，接受參議員郭國基有關臺灣大學招生放寬尺度及教育部存放臺灣大學器材處理問題的質詢，他最後回答說：「我對有才能、有智力的窮學生，絕對要扶植他們！」答詢完畢回座時，腦溢血突然發作，經急救無效後，延至晚間11時20分終告不治，享年55歲。第二天，臺灣大學停課一天，並降半旗致哀。對於一代學人的隕越，師生一片愕然，部分學生執著「痛失良師」布條蜂擁至省參議會抗議，經教育廳長



陳雪屏反覆解說，學生才散去。大學當局決定以其第四次校慶演說「敦品、力學、愛國、愛人」作為校訓，並將其骨灰葬於臺灣大學校園，名為傅園，另鑄鐘紀念，名為傅鐘。

傅斯年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的典範，也是五四運動的健將，充分展現其對社會、政治問題的關懷。其後赴西歐留學，廣泛接觸各種新學術，奠定其一生學術、事業發展之重要基礎。返國後，勤於研究著述，並關心時政，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積極擘劃和推動中國歷史、語言及考古學之研究，短期間即獲致顯著成果。1949年1月接任臺灣大學校長後，廣泛延攬著名教授，配合需要增建校舍，充實圖書設備，積極獎勵研究，尤其堅持校園內之自由學風，奠定了臺灣大學的學術根基及自由傳統。其一生對學術界、教育界之貢獻厥功甚偉。

參考文獻

- 傅斯年（1980）。**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
- 王汎森、杜正勝編（1995）。**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李東華（1996年11月）。勳績盡瘁，死而後已—傅孟真先生在臺大。**臺大歷史學報**，**20**，頁129-161。
- 韓復智編（1996）。傅斯年先生年譜。**臺大歷史學報**，**20**，頁231-306。
- 國史館（1996）。傅斯年先生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5輯**，頁501-507。台北縣新店市。
- 李秀美（2000）。傾聽傅鐘的迴盪聲響—臺大校長傅斯年。**台北人物誌**，頁18-23。台北：台北市政府新聞處。